词法－句法界面下的复合词编码与解码
——基于“劝 X”类复合词的个案研究

马 伟 忠[1]，施 春 宏[2]

（1. 华侨大学　华文学院，厦门　361021；2. 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科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基于对“劝 X”类复合词的个案研究，本文主张词法－句法界面互动下的复合词研究路径和基于用法模型的方法论。“劝 X”类复合词的编码与解码具有特定的认知语用动因。“劝 X”的语义解码、编码与劝解事件框架相关，“劝”句法框架分布与“劝”事件框架编码具有对应关系。利他主义和文化模型影响“劝 X”的语义识解，“劝 X”的语义识解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认知加工相结合的过程。最后分析了“劝 X”的造词编码机制，复合词“劝 X”有两种编码模式：“劝 V”型和“劝 N”型。

关键词：词法－句法界面；复合词；编码；解码
中图分类号：H1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263(2019)04-0008-09

一　引言：复合词语义识解中的难题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对于语言表达式的意义是如何编码并解码的，形式语言学派一般支持弗雷格的语义组合性原理，也就是认为语言中的每一个表达式的意义可以从其组成成分意义和组合结构方式上推导出来。比如，在例 1）中，句子的意义是由每个单词所带有的语义按照句法的层次性组合起来的；在例 2）中，复合词“白嫩”、“劝导”的意义是由其构成语素所带有的语义直接组合起来的。

1) 我喝酒了 ＝ （我+（（喝+酒）+了））

2) 白嫩 ＝ 白+嫩　　【白嫩】白而细嫩。　　劝导 ＝ 劝+导　　【劝导】规劝开导。

然而，例 3）中动性复合词“劝酒”、“劝架”的语义却不是其组构成分“劝”与“酒”“架”语义的直接相加，似乎弗雷格的语义组合性原理在这里遇到了困难。

3) a. 【劝酒】（酒席上）劝人喝酒。　　劝酒 ≠ 劝+酒　　劝酒 ＝ 劝+喝酒

b. 【劝架】劝人停止争吵、打架。　　劝架 ≠ 劝+架　劝架 ≠ 劝+打架　劝架 ＝ 劝+不+打架

一般而言，符合弗雷格的语义组合性原理的表达式语义透明度高，人们较易从其组成部分语义推出整体语义。那么，我们可以很自然地得出：复合词“白嫩”“劝导”的语义透明度要高于“劝酒”“劝架”类。然而，我们也发现了一个较有趣的现象：“劝酒”是“劝人喝酒”（劝进），人们基本上不会把“劝酒”识解为“劝人不喝酒”；“劝架”是“劝人不打架”（劝阻），人们几乎不会把“劝架”理解成“劝人打架”。

相同结构的“劝 X”复合词却表达劝进和劝阻两种截然不同的语义，这种语义识解的不对称性是怎样造成的？这种复合词是怎样产生的？约定俗成的解释太过于模糊。董秀芳（2004：202-203）认为词汇化和词法模式都可以创造新词，词汇化过程起点是短语或句法结构，而词法过程的作用对象则是语言中

基金项目：华侨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基于使用观的汉语 N_1 的 N_2 事件表达构式研究”（17SKBS303）；北京语言大学重大专项项目“基于多重互动关系的语法理论探索与应用研究”（18ZDJ04）

作者简介：马伟忠，男，1987 年生，山东泰安人，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语法学、理论语言学；施春宏，男，1967 年生，安徽青阳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语法学、理论语言学。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原有的词或语素。可以说，复合词产生的词汇化过程主要发生在句法层面。根据 Givón（1971）“ 今天的词法曾是昨天的句法 ” 这一著名观点，词法模式造词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从句法层面进行分析。总之，无论是词汇化还是词法模式造词，复合词编码形式上都会涉及到句法层面。因此，我们主张从词法－句法界面入手分析复合词组构成分句法语义特征，从认知语用角度探求复合词 “ 劝 X ” 编码和解码机制。

二　与动词 “ 劝 ” 相关的多种句法框架

要研究 “ 劝架 ”“ 劝酒 ” 类复合词的结构形成和语义识解动因，我们首先要了解及物动词 “ 劝 ” 的句法、语义特征。我们从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料库（简称 BCC）综合项中检索到含有 “ 劝 X ”[①]的语句 7267 例，剔除 “ 横劝竖劝 ”“ 劝阻 ”“ 劝错 ”“ 劝住 ” 之类习语、双音节结构[②]，共得到符合条件的现代汉语句子 1328 例。我们对这 1328 例句子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BCC 中与 “ 劝 ” 相关的主要句法框架的分布　　表 1

句法框架	出现数目及比例
a. NP1+劝+ NP2+ VP	950（71.5%）
b. NP1+劝+ NP2	202（15.2%）
c. NP1+劝+ NP2+ S	98（7.4%）
d. NP1+劝+ VP[非单音节]	69（5.2%）
e. NP1+劝+ AP[非单音节]	5（0.4%）
f. NP1+劝+ QP	4（0.3%）

“ 劝 ” 主要出现在六种句法框架中，如下例句所示：

4) 框架一：NP1+劝+NP2+VP

a. 阿政府劝居民将钱存入国家银行。　　b. 我们看不惯，劝大爷别管这些人。

5) 框架二：NP1+劝+NP2

a. 他们紧张地劝爷爷、奶奶，灵儿以为自己的话触犯了老人，因此吓得大哭起来。

b. 二哥，你劝劝大哥。

6) 框架三：NP1+劝+NP2+S

a. 思佳再劝母亲：“ 妈，你别担心，我知道轻重的。”

b. 兰香回来了，劝田稻：“ 你就别再说娘了，都怪我没看牢娘。”

7) 框架四：NP1+劝+VP

a. 上了二楼到正对楼梯口那组柜台前，一女售货员热情劝买东西。

b. 趁著今天这个机会，你说句好话逗她开心，把她劝回家吧！

8) 框架五：NP1+劝+AP

a. 不过，不出三天，我必能把他劝明白了！

b. 走吧，趁我劝你还没劝腻烦，要不，我就一个月不跟你说话。

9) 框架六：NP1+劝+QP

a. 他又劝了一阵子，终于将凌天雄劝出去了。

b. 颜成康看见姗姗连忙说：“ 其实明诚没喝什么酒，那些欧洲人每人劝一口，大概喝了一杯半。”

我们可以看出，“ 劝 ” 所处的句法框架具有多样性，框架一（NP1+劝+NP2+VP）在真实文本中出现最多，是一种基础框架，其基本语义结构是 “ 施事+动作（劝）+受事+事件命题 ”，如例 4）。如果把框架一及其语义结构看作一种原型结构，其他框架结构则或多或少地对某些结构成分或语义成分有所隐匿或

① 我们以 “ 劝 X ” 为检索项，主要考察 “ 劝 ” 字短语做谓语的语句，而 “ 劝 ” 基本上不能单用，因此我们不考察 “ 你最好听我劝 ” 这类句子。

② 这里主要考察 “ 劝 ” 与其他词语组合分布的情况，因此要剔除 “ 劝 X ” 复合词，如 “ 劝阻 ”；但有时 “ 劝 X ” 类似于离合词，它既可以是词的形式，如 “ 劝住 ”，又可以是短语形式，如 “ 劝不住 ”。为了简便，我们也将 “ 劝住 ” 这类结构剔除，也就是不考虑 “ 劝 X ” 中 “ X ” 为单音节词的情况。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凸现：框架二隐匿了表示事件命题的 VP 成分，如例 5）；框架三是在框架二的基础上，将表示事件命题的 VP 用一个表意完整明确的句子进行凸现，如例（6）；框架四将表示受事的 NP 成分隐匿，如例 7）a，或者通过某些句法手段使得原本符合时间顺序原则的 NP 句法位置发生变化，如 7）b 通过“ 把 ”字句将受事“ 她 ”提前；框架五隐匿了事件命题 VP，受事 NP 成分的处理则与框架四相同，但是这种框架增加了动作“ 劝 ”的结果，如例 8）中“ 劝 ”的结果是“ 明白 ”“ 腻烦 ”；框架六隐匿了事件命题 VP 和受事 NP 成分，但增加了动作“ 劝 ”的频次描写，如例 9）中“ 一阵子 ”“ 一口 ”。虽然“ 劝 ”所在的某些句法框架相对于框架一来说，句法或语义成分有隐匿的情况，但是通过上下文或对话语境，我们都可以将这些缺省语义推导出来，不影响我们对句子意义的正确理解，如例 10）、11）：

10) 穆先生，请你劝劝小姐，她从昨晚开始没吃过一粒饭、喝过半滴水，我真怕她身子吃不消。

11) 可主席一向“ 恋旧 ”，衣服破了不愿换，鞋子旧了不愿扔。这次，韩桂馨不知劝了多少遍，左说右说，主席还是不愿意换掉，只是说：“ 还能穿，还能穿。”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 劝 ”出现在如例 4）- 9）所示的不同句法框架中，但是这些句法框架都表达了相似的劝解事件（advising event）。这些场景事件究竟是怎样对“ 劝 ”所在句法框架的编码产生影响的？这与人类对动词“ 劝 ”意义的识解方式有关。

三　动词意义的识解：基于事件的框架－语义表征

前文可看出，动词“ 劝 ”可出现在表义不同的多种句法框架中，按照 Goldberg（2006：5）对构式宽泛的定义，学得的形式与语义或话语功能的配对都可看作构式，那么“ 劝 ”所处的句法框架也是一种构式。Goldberg（1995：39）提出的场景编码假说（scene encoding hypothesis）认为，与基本句子类型对应的构式把与人类经验有关的基本事件类型编码成了这些构式的中心意义。而这些事件类型则与动词意义的识解密切相关，正如 Fillmore & Atkins（1992：75-77）所指出的：“ 一个单词的意义只有指向一个有关经验、信仰或习惯的结构化的背景（structured background）才能被识解，这种背景组成了理解单词意义的概念上的先决条件。可以说，说话人只有首先理解了能够激活那个单词所编码概念的背景框架，他才能知道那个单词的意义。这种方法中，词与词或词义与词义之间没有直接关联，而是借助于它们与普遍背景框架的连接（links）以及凸显这些框架的某些特别成分的方式指示（indications of the manner）相关联。”

动词“ 劝 ”在《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中的释义为“ 拿道理说服人，使人听从 ”[①]。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正如 Austin（1962）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所认为的“ 说话就是做事 ”，他区分了三种言语行为：发话言行（locutionary act）、示意言行（illocutionary act）和取效言行（perlocutionary act）。“ 劝 ”就是一个典型的试图使听话人为说话人做某事的指令类（directives）言语行为动词（Searle 1979：13）。如例 12）所示：妈妈说出一个有意义话段的行为是一个发话言行；妈妈说话目的是想改变儿子今天爬山的行为意图，这是示意言行；最后妈妈所说的话对听话人起到了效果“ 儿子今天不去爬山了 ”，这是取效言行。

12) 妈妈：“ 天太冷，我劝你今天不要去爬山了。”儿子：“ 知道了，等天暖和了我再去。”

言语行为理论为我们了解“ 劝 ”所在句法结构背后的结构化背景框架提供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视角。但是言语行为分析主要关注会话口语，我们不仅仅关注“ 劝 ”在对话中的表现，也关注“ 劝 ”在篇章中的句法表现。从语料关注面更广的框架－语义视角来看，“ 劝 ”所处的句法结构语义上呈现出了一个劝解场景（the scene of advising），具体来说这种句法结构编码了一种类似于脚本（script）的顺序化的事件框架；“ 劝 ”事件框架可以依次分解为原因事件、劝说事件、内容事件和结果事件四个次事件框架。

“ 劝 ”事件框架（简称 E 劝）=

i.原因事件（E 原因）：存在一个表示原因或目的的事件致使 A 劝说 B；

ii.劝说事件（E 劝说）：A 劝说 B；

iii.内容事件（E 内容）：B 应该按照 A 所说的要求去做；

①《现代汉语词典》中“ 劝 ”还有第二个义项：<书>勉励：~学。我们认为，从共时角度来看，“ 拿道理说服人，使人听从 ”是最基本常见的义项。它蕴含两种结果情形：一是使人听从去做某事，即“ 勉励/鼓励某人做某事 ”；二是使人听从不去做某事，即“ 劝阻/阻止某人做某事 ”。第一个义项可以推导出第二个义项，并且口语、书面语中都能使用，因而文中我们只取“ 劝 ”的第一个义项作为立论的出发点。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iv.结果事件（E 结果）：B 对 A 的劝说有所行动，或者接受或者拒绝。

“劝”所在的六种句法框架基本上是对“劝”事件框架的一种部分编码形式，其具体编码情况如表 2。

“劝”句法框架与其事件框架编码的对应关系　　表 2

“劝”句法框架	“劝”事件框架编码
框架一：NP1+劝+NP2+VP	E 劝说 ＋E 内容
框架二：NP1+劝+NP2	E 劝说
框架三：NP1+劝+NP2+S	E 劝说 ＋E 内容
框架四：NP1+劝+VP	E 劝说 ＋E 内容
框架五：NP1+劝+AP	E 劝说 ＋E 结果
框架六：NP1+劝+QP	E 劝说

可看出，劝说事件在劝解场景中居于核心地位，原因事件在“劝”所处的句法框架中无相应编码形式，但对“劝”事件框架的完全编码，可在一个表意相对完整的语篇或会话结构中得到反映，如例 13)、14)。

13) E 原因[最近，老师特来告诉我，本来守纪好学的小芹成绩已直线下降，经常不到学校上学。据了解，是其父把她留在家里带弟弟。为此，] E 劝说[我劝小芹的父亲] E 内容[要要善待女儿，不可虐待，] E 结果[可其父听不进去。]

14) E 原因[飞机设计所副所长欧阳绍修要随邹延龄一起上飞机去测试验证理论数据，] E 劝说[他妻子方静拉着他哭了三次：“欧阳，我劝你] E 内容[千万别上飞机，] E 原因[邹大队长虽然技术好，但他没有飞过风险科目，我们家出不得事儿……”] E 结果[欧阳绍修说：“你别担心，没事的。”欧阳绍修说服妻子，上了飞机。]

四　“劝 X”语义识解的认知语用动因

前文中，我们从句法入手，对“劝”的句法框架和概念框架进行了分析，现在我们着手分析“劝 X”的语义识解动因、构词机制及其发展状况。

无论“X”是成词语素还是不成词语素，我们都能够联想到以“X”作为构件的词群（lexical group）。如，“酒”可联想到“喝酒”“酿酒”“倒酒”“戒酒”“禁酒”等多种语义。“劝 X”中“X”识解为哪一个词义，是由人们对“X”词群中每个词的语义所表示的生活场景的熟悉程度决定的。从日常交际来看，“喝酒”场景比“酿酒”“倒酒”“禁酒”更常见、更熟悉，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劝酒”的“酒”与“喝酒”场景密切相关。同样，“打架、吵架”场景比“绑架、约架”在生活中更常见、更熟悉，“劝架”中的“架”与“打架、吵架”场景密切相关。这只是“劝 X”语义识解的第一步，我们还要进一步解决为什么“劝架”要识解为“劝人不打架”而“劝酒”不可以识解为“劝人不喝酒”的问题。这应有更高层次的交际原则和交际模式在起作用，其中主要与利他主义（altruism）和文化模型（cultural model）有关。

利他主义[①]与自私自利相对，是现代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人类行为普遍具有利他主义倾向，利他主义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在劝解场景中，劝者主观认为被劝者处于困境中有接受帮助的需要，试图通过劝说行为改变对方的信念、行为从而帮助被劝者走出困境。利他主义在劝解场景中具体表现为两种策略，一种是趋利策略，即劝者劝说被劝者应该要做某些劝者主观认为的好事；另一种是避害策略，即劝者劝说被劝者不要做某些劝者主观认为的坏事。在与“劝”相关的最常见的基本句法框架“NP1+劝+NP2+VP”（950 例）中，趋利策略常常表现为一种无标记语言形式（出现 754 例，约占 79.4%），如例 15）；相对地，避害策略常常表现为带有“不”“别”“莫”等否定词的有标记的语言形式（出现 196 例，约占 20.6%），如例 16)。

15) a. 儿子与几个哥们冲老子一吹二吹，说股市最近还要“牛”，劝老子赶快再买三千股 Y M股票。

b. 营业员说店里的菜刀质量不好，劝妻子到另外一家去买。

c. 北京人喜欢王先生的歌，北京是先生魂系梦萦的故乡，我们劝先生回归故土吧！但他却说：“我不能回来，我的根在新疆！”

① 有关利他主义的研究论述可以参看彭茹静（2003），Myers（2005：440-481)。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6) a. 她早就劝爹爹不要与吴三桂的党羽太过接近，否则早晚有一天会受牵连。
b. 他劝人别把大好时光，尽用在求名、升官、发财上面。
c. 这丫鬟劝小姐莫伤心，她却忽然自己伤心起来。

无论劝者采取趋利策略还是避害策略进行劝解，无论结果是否真正对被劝者有利，无论被劝者是否接受劝者的建议，都不可否认劝者对被劝者的利他主义倾向。而当人们对复合词“劝X”进行语义识解时，发生移情（empathy），人们会站在劝者的立场并且认同劝者的行为观念。这也就不难理解“劝架”要识解为“劝人不要打架/吵架”，“劝酒”要理解为“劝人喝酒”了：“打架斗殴或吵架”在所有社团中都是不好的行为，当人们理解复合词“劝架”语义时会移情到劝者“你要打架，我劝你不要打架，这样你才不会被别人打伤或违法被捕”；同理，“喝酒”也是建立在这样的利他主义原则上“你不喝酒，我劝你喝，这样你才能享受喝酒的快乐或者更好地与人搞好关系”。

然而，虽然利他主义是不同语言社团都具有的社会心理倾向，但是不可以将利他主义理解成一个抽象的无限制原则，也并不意味着所有语言社团在判断利他行为上具有统一的标准。这里我们引入文化模型的概念，文化模型可看作是属于一个社团或亚社团的所有人共有的心理体验，是变化的，文化模型对认知范畴及其结构的正确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Ungerer & Schmid 2006：51-58）。就“喝酒”而言，不同社团的人对此的识解反映是不一样的。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化圈，酒文化盛行，俗话说“无酒不成席”“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酒桌上开怀畅饮也就成了增进主、客人感情，保持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途径。而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伊斯兰文化圈，是禁止伊斯兰教徒喝酒的，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阿拉伯人刚学习复合词“劝酒”时，如果不告诉他中国的酒文化，或许他会很难理解“劝酒”应该识解为“劝人喝酒”而不是“劝人不喝酒”。

总之，利他主义[①]是在劝解场景下识解“劝X”的根本原则；文化模型则起着衡量利他行为进而决定识解“X”语义的重要作用。如，众所周知“吸烟有害健康”，在利他主义移情视角下，我们可将“劝烟”识解为“劝人不吸烟”，如例17）a；但传统上给人敬烟、劝人吸烟似乎成为一种人情世故的社交礼仪，烟酒文化盛行，在这种文化模型下，我们更有可能将“劝烟”识解为“劝人吸烟”[②]，如例17）b。

17) a. “禁烟令”渐行渐近，在不少人仍然纠结于“上海能否真禁烟”的同时，另一批人已开始琢磨着如何禁烟———“劝烟技巧”成了一门新课题。（百度）
b. 高、沙两家一起饭聚，但仁泰见沙祥父子不断向智力劝酒劝烟，更与儿子大谈赌马波经，不禁有所微言。（百度）

然而，文化模型不是静止而是变化着的，随着吸烟危害的普及、公共场所禁烟运动的兴起和文明健康的社交礼仪的建立，吸烟的好处似乎越来越少，可以预测将来有一天“劝烟”在人们观念中或许更倾向识解为“劝人不吸烟”。

五　“劝X”语义识解程序：走精致还原主义之路

前面我们找出了影响“劝X”语义识解的认知动因，接下来我们将要探讨“劝X”语义识解程序。根据词义透明度的高低，我们把部分填充的“劝X”词构式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劝X”透明构式，如“劝酒”（劝人喝酒）、“劝和”（劝人和解）；第二类是“劝X”比较透明构式，如“劝架”（劝人不打架）、“劝赌”（劝人不赌博）；第三类是“劝X”比较隐晦构式，如“劝驾”（劝人出去担任职务或做客）、“劝进”（劝说实际上已经掌握政权而有意做皇帝的人做皇帝）。其中第三类“劝X”比较隐晦构式语义不可完全推导得来，它们将作为一个整体学得进而储存在语言学习者的词库中[③]；而第一类和第二类“劝X”

① 利他主义原则在语义识解消歧中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它也可以说明袁毓林（2014）用乐观心理原则解释的“救火”“养病”“恢复疲劳”“打扫卫生”等看似逻辑乖谬的表达。限于篇幅，本文不做进一步的阐释。
② 我们进行了一个语感调查，30人中有22人把“劝烟”识解为“劝人吸烟”，约占总人数的73.3%。这里，词库中不仅包括具有特异性和意义不可推导的词、语素、习语，也包括言语社团所接受的形义固化、透明度高的词。
③ “劝X”语义是否可推导是从语言学习者角度就现代汉语词汇语义系统来说的，这里有一个假设前提，“劝X”对于学习者来说是“生词熟字”。学习者所掌握的现代汉语词汇“驾”没有“担任职务或做客”（或许这是“驾”在古代汉语中的意义遗留）的意义，也就不能推导出“劝驾”的语义。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构式语义都可以完全推导得出，其语义识解程序如下所示：

i.“劝X”构件分解：劝X→劝+X；

ii.构件“劝”语义识解：激活整个劝解场景/“劝”事件框架；

iii.构件“X”语义识解：“X”激活某个“劝”次事件框架；

“X”激活E劝说 ：劝告（忠告），劝说（言说）

“X”激活E内容 ：劝酒（喝酒，戒酒，酿酒，倒酒），劝架（打架，吵架，绑架等）

“X”激活E结果 ：劝醒，劝哭

iv.语义消歧、识解（主要针对E内容）：利用利他主义原则或文化模型，如：

劝酒→劝人喝酒（利他主义+文化模型）　　劝架→劝人不打架（利他主义）

劝烟→劝人吸烟（利他主义+文化模型）　　劝烟→劝人不吸烟（利他主义）

从“劝 X”这类部分填充的词构式的语义识解中，可以看到构式识别的两种加工模式：以“劝酒”“劝架”为代表的识别过程由构式的构件部分引起的自下而上的加工（bottom-up processing）和以“劝驾”“劝进”为代表的由构式整体引起的自上而下的加工（top-down processing）。然而，施春宏（2008）、王寅（2009）在句法层面论证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加工模式相结合识解词以上单位构式的必要性，我们认为在词构式识别中，这种加工模式也是十分必要的。虽然词汇学习者不能完全推导出“劝驾”的精确语义，但是从其构件“劝”能够得到“劝驾”的模糊语义“劝说某人做某事”，这体现了自下而上的加工模式。虽然构件“劝”“酒、架”对“劝酒”“劝架”的语义识解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劝酒”“劝架”的语义识解也体现了自上而下的加工模式。首先，正如前面我们所认为的动词“劝”语义的识解离不开与“劝”相关的结构化的背景知识，而这些背景知识则通过与“劝”相关的整个句法框架得到体现。其次，“劝酒”“劝架”的语义识解离不开利他主义、文化模型这一居于“上”的认知语用动因的制约。此外，王春茂、彭聃龄（1999）和郭胜春（2004）、刘伟（2004）、张江丽（2010）等通过实验考察了语素义与词义识解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词构式识解需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加工模式。

语法研究中，纯粹的自下而上的机械主义还原论与纯粹的自上而下的整体论都有一定的弊端，我们既不能因为强调整体的特性而忽视了还原分析的价值，也不能因强调还原分析的操作性而忽视构式的整体特性。我们主张在语法研究中将两种加工模式相结合，走精致还原主义之路，立足整体，分层还原，在整体还原为部分及其关系的过程中，逐步整合，重在探讨整体构造的机制、动因和制约条件。（参看施春宏2008、2013、2016）

六 “劝X”的造词编码机制

从语言的编码和解码角度看，“劝X”的语义识解是一个解码过程，而“劝X”的形成是一个编码过程，且编码者须是一个解码者，而解码过程不必同时编码。“劝X”编码形式的形成具有鲜明的现实基础。

现代汉语词汇中双音节所占比重最大，汉语词汇具有从单音节到双音节的发展趋势。这主要是由汉语的韵律特征决定的：双音节音步是现代汉语最小的、最基本的“标准音步”；根据韵律构词法的理论（冯胜利，2009），现代汉语的“标准韵律词”只能是双音节模式。双音节模式是汉语构词的现实基础，对“劝X”的双音节形式起了框定作用。双音节模式只是“劝 X”编码的一个现实性条件，下面我们重点探讨在双音节模式下“劝X”的造词编码机制。

众所周知，词是人们为表达的需要对事物、事件等进行命名的音义结合的语言符号。索绪尔（1916）认为语言符号具有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的区分，只有一部分符号是绝对任意的；别的符号中却有一种现象可以使我们看到任意性虽不能取消，却有程度的差异：符号可能是相对地可以论证的，例如法语的poirier“梨子”会使人想起poire“梨子”这个单纯词，它的后缀-ier又会使人想起cerisier“樱桃树”，pommier“苹果树”等等。类似地，汉语词汇从单音节词发展到双音节词为主，新词的产生广泛采用词根复合法，这种一定程度上符合语义组合性原理的编码方式带有更多的理据性。“劝X”的编码正是采用了具有一定理据性的复合法：大部分“劝X”复合词都是以成词语素“劝”为主要构词要素对劝解场景进行某种程度上的编码，“X”是对劝解内容的编码。那么“X”是如何被人们选择而进入“劝X”中的？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吕叔湘先生在《语文常谈》中有极具启发性的一段话：“像‘谢幕’那样的字眼，就放弃了很多东西，只抓住两点，‘谢’和‘幕’。说是‘放弃’，并不是不要，而是不明白说出来，只隐含在里边。比如‘苹果’，并不指一种无一定大小、颜色、形状口味的东西；同样，‘布鞋’‘谢幕’也都隐含着某些不见于字面的意义。语言的表达意义，一部分是显示，一部分是暗示，有点儿像打仗，占据一点，控制一片。”（吕叔湘 2002[1980]：226）按照场景编码假说[①]，就词构式的编码而言，“显示的点的部分”就是那些进入词构式中表示某种概念场景中凸显部分的语素构式，这些语素构式具有较高的可及性[②]（accessibility）。

此外，从汉语词汇化过程来看，不少复合词的源头是短语，其组成部分原是可以自由运用的词（董秀芳 2011：98）。而动词语义上一般表示动作事件，名词一般表示事物实体。按照词构式编码中“显示的点的部分”要求，我们可以推测表示劝解事件的“劝 X”的两种复合法编码模式：一种是选用直接激活凸显“劝”次事件框架的动词“V”与动词“劝”进行编码的认知上最省力的形式“劝 V”型，如“劝说（E 劝说）”、“劝阻（E 内容）”等；另一种是选用 E 内容中高可及性的受事名词“N”与进行编码的“劝 N”型，“N”转喻劝解场景的某一具体事件内容，如“劝酒（喝酒）”、“劝架（打架）”等。我们对《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已经固化的“劝 X”构词类型实例的统计（表 3 所示）发现“劝 V”型编码形式远远高于“VN”型，这也说明人们更倾向于选择认知上简便省力的编码模式。

“劝 X”构词类型及实例　　表 3

类型	实例
劝 V（18 例）	劝导、劝告、劝和、劝化、劝驾、劝谏、劝解、劝诫、劝戒、劝进、劝募、劝说、劝退、劝慰、劝降、劝诱、劝止、劝阻
劝 N（2 例）	劝架、劝酒

在劝解场景事件的词编码过程中，用表事物的“N”转喻某一劝解的具体事件内容，看似不如用表动作的“V”表示事件直截了当，其实事实有时并非如此。“劝 N”这种编码方式是劝解场景事件语义表达精细化的需要，而且人们具有自动推理识解劝解场景下“劝 N”语义的能力。以语义“劝人喝酒”的词汇编码为例[③]，“喝”和“酒”似乎都可以进入“X”的选择范围，产生词“劝喝”和“劝酒”。“劝人喝酒”相对于“劝人喝某种东西”而言表明了喝的对象“酒”，词构式“劝酒”一定是“劝人喝酒”，当然这种识解结果与前文分析的认知语用动因有关；但“劝喝”未必是“劝人喝酒”，如例 18）、19）。同理，词构式“劝架”也可以如此理解，只不过“架”比“酒”语义更为抽象。

18）火车站附近有位卖茶水的老大娘，每当看见巡警战士走来，都要端出两碗茶水劝喝。（BCC 报刊）

19）每天睡到大中午，老爸老妈干完活还要煮饭叫我们起床吃，吃完又继续钻被窝玩手机，饭菜不合胃口还要老妈端到床前来劝吃劝喝。（BCC 微博）

此外，通过 BCC 语料库我们也找到了《现代汉语词典》未收录形义未完全固化的“劝 N”类构式，如：“劝菜”（100 例）、“劝烟”（49 例）、“劝婚”（38 例）、“劝茶”（27 例）、“劝饭”（25 例）、“劝仗”（6 例）、“劝水”（4 例）、“劝肉”（1 例）、“劝歌”（1 例）、“劝舞”（1 例），它们的使用频率远远少于已经固化的“劝酒”（3885 例）、“劝架”（3110 例）。使用频率在“劝 X”固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也许语言使用个体新造一个“劝 N”并完全掌握了它，结果对他而言“劝 N”是一个固化的语言单位，但这个“劝 N”并未进入现代汉语词库。只有当一个单位在言语社团中广泛使用时，才成为有可能作为一个重要候选对象进入该语言的语法中（Langacker 1987：62）。当新造“劝 X”使用频率达到多少，“劝 X”才能够完全固化，这需要进一步研究。

① 我们认为 Goldberg（1995：39）场景编码假说不仅仅适用于与人类经验有关的基本事件类型相关的句子构式的编码，也可以扩展到词构式（特别是带有理据性的合成词）的编码中，如复合词“劝 X”中“X”可以激活某个“劝”次事件框架。

② 可及性原为心理学术语，心理语言学用来指说话人推测听话人从记忆中提取一个语言单位的难易程度。

③ 词汇化研究有共时和历时两种研究路径，这里我们主要从共时考虑在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下构拟表达劝解事件义“劝 X”的编码过程。本文的编码过程是指共时研究中假设的组词造句的抽象机制，不是指历时研究中某个词语或句子产生和形成的具体过程。我们特别同意沈家煊（2008）的观点，共时研究所假设的生成方式（本文称为编码机制）不受时间的限制，它在历史上也时时在起作用，我们完全可以用这种假设的理论来解释历史上某些格式的生成；逻辑先后（共时研究）最好跟历史先后（历时研究）相吻合，但是并不因为跟历史先后不合而被否定。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七　结语：复合词研究中的词法－句法界面与基于用法的模型

人类言语交际都会涉及到语义信息的编码和解码，本文以“ 劝 X ”词构式为例研究了复合词编码和解码背后的认知语用动因。我们首先从动词“ 劝 ”的句法语义特征入手，发现“ 劝 ”主要出现在表达六种句法框架中，这些句法框架呈现出了一个劝解场景，具体来说这种句法结构编码了一种类似于脚本的顺序化的事件框架；“ 劝 ”事件框架可以依次分解为原因事件、劝说事件、内容事件和结果事件四个次事件框架；而“ 劝 X ”的识解和编码都与这些次事件框架密切相关。然后，我们分析了“ 劝架 ”和“ 劝酒 ”类“ 劝 X ”构式的语义识解的认知语用动因，认为利他主义是在劝解场景下识解“ 劝 X ”的根本原则；文化模型则起着衡量利他行为进而决定识解“ X ”语义的重要作用。从“ 劝 X ”构式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语义识解程序分析中，我们主张走精致还原主义的语法研究之路。最后我们分析了“ 劝 X ”的编码机制。双音节模式是汉语构词的现实基础，对“ 劝 X ”的双音节形式起了框定作用。“ 劝 X ”的编码采用了具有一定理据性的复合法模式，其组构成分具有较高的可及性，是劝解事件框架中的凸显部分。我们推导出劝解事件的“ 劝 X ”词构式的两种主要编码模式：“ 劝 V ”型和“ 劝 N ”型。“ 劝 V ”型的编码和识解在认知上都是最省力的；“ 劝 N ”这种编码方式是劝解场景事件语义表达精细化的需要，“ N ”转喻劝解场景的某一具体事件内容，人们具有自动推理识解劝解场景下“ 劝 N ”语义的能力。

关于汉语复合词结构（词法）与句法结构（句法）的关系问题，前人（朱德熙 1982：25，32；刘叔新 1990；王政红 1998；贺阳、崔艳蕾 2012；施春宏 2017 等）已有很多探讨，大多数学者基本同意词法结构与句法结构的一致性。我们也基本同意朱德熙（1982：32）的论断“ 汉语复合词的组成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基本上是和句法结构的关系一致的；句法结构关系有主谓、述宾、述补、偏正、联合等等，绝大部分复合词也是按照这几类结构关系组成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相同的结构关系也表示相同的语义关系。例如复合词“ 劝酒 ”和短语“ 吃苹果 ”看起来都是动宾关系，“ 吃饭 ”语义关系是“ 动作－受事 ”，但“ 劝酒 ”的语义关系却不是简单的“ 动作－受事 ”。本文“ 劝 X ”的解码和编码机制为我们辩证地看待汉语复合词的语法性质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 劝酒 ”是劝解场景下“ 劝说 ”、“ 喝酒 ”两个次事件的整合，“ 酒 ”转喻劝解场景的某一具体事件内容 “ 喝酒 ”。复合词的编码和解码离不开人类共有的认知概念框架结构。

总之，通过对“ 劝 X ”复合词的个例研究，我们倾向于这样一种复合词的研究路径和方法论：路径上，不局限于复合词的静态构词结构类型分析，主张在词法－句法界面下探求复合词编码与解码背后的认知语用动因，进而研究人们对词、句子、篇章等语言单位的编码、解码是否具有相同的认知概念基础、社会语用心理；方法论上，我们主张基于用法的模型（usage-based model），强调使用频率、语境、真实使用的语料、认知语用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参看 Kemmer & Barlow 2000）。

参考文献：

董秀芳　2004　《汉语的词库与词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董秀芳　2011　《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修订本），商务印书馆。
冯胜利　2009　《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郭胜春　2004　汉语语素义在留学生词义获得中的作用，《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6 期。
贺阳、崔艳蕾　2012　汉语复合词结构与句法结构的异同及其根源，《语文研究》第 1 期。
刘伟　2004　《语义透明度对留学生双音节合成词词汇通达的影响》，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刘叔新　1990　复合词结构的词汇属性——兼论语法学、词汇学同构词法的关系，《中国语文》第 4 期。
吕叔湘　1980　《语文常谈》，《吕叔湘全集》（第六卷），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年。
彭茹静　2003　利他主义行为的理论发展研究，《江西社会科学》第 7 期。
沈家煊　2008　“ 逻辑先后 ”和“ 历史先后 ”，《外国语》第 9 期。
施春宏　2008　句式研究中的派生分析及相关理论问题，《世界汉语教学》第 2 期。
施春宏　2013　句式分析中的构式观及相关理论问题，《汉语学报》第 2 期。
施春宏　2016　互动构式语法的基本理念及其研究路径，《当代修辞学》第 2 期。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施春宏　2017　汉语词法和句法的结构异同及相关词法化、词汇化问题,《世界汉语教学》第 2 期。
索绪尔　1916　《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 年。
王春茂、彭聃龄　1999　合成词加工中的词频、词素频率及语义透明度,《心理学报》第 3 期。
王寅　2009　构式压制、词汇压制和惯性压制,《外语与外语教学》第 12 期。
王政红　1998　复合词结构的语法属性问题,《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2 期。
袁毓林　2014　汉语词义识解的乐观主义取向——一种平衡义程广泛性和义面突出性的策略,《当代语言学》第 4 期。
张江丽　2010　词义与语素义之间的关系对词义猜测的影响,《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3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2016　《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商务印书馆。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Austin, J. L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Fillmore, C. J. & B. T. S. Atkins　1992　Toward a frame-based lexicon: The semantics of RISK and its neighbors. In A. Lehrer & E. F. Kittay (eds.) *Frames, fields and contrast: New essays in semantic and lexical organization*.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pp. 75-102.
Givón,T　1971　Historical syntax and synchronic morphology: an archaeologist's field trip.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7: 394-415.
Goldberg, A. E　1995　*Constructions：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oldberg, A. E　2006　*Constructions at work：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emmer, S. & M. Barlow　2000　Introduction: A usage-based conception of language. In M. Barlow & S. Kemmer (eds.) *Usage-based models of language*. CSLI Publications, Stanford. pp. 1-64.
Langacker, R.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yers, D. G　2005　*Social psychology* (10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Searle, J. R　1979　*Expression and mea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ngerer, F. & Hans-Jörg Schmid　2006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2nd edn. London: Pearson Longman.

On the Encoding and Decoding of Compound Words under the Morphology-Syntax Interface: a Case Study of Compound Words "*Quan*（劝）X"

MA Wei-zhong[1] and SHI Chun-hong[2]

(1.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ollege, 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China; 2. Faculty of Linguistic Scienc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dvocates a research approach of compound words under the morphology-syntax interface and a methodology of the usage-based model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compound words "*quan*(劝)X". The encoding and decoding of "*quan*(劝)" have specific cognitive and pragmatic motivations. Their semantic decoding and encoding are related to the advising event frames. The distribution of "*quan*(劝)" syntactic frames and the encoding of "*quan*(劝)" event frames have a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The altruism and cultural models affect the semantic decoding of "*quan*(劝)X" and the semantic decoding process of "*quan*(劝)X" is composed of the top-down processing and the bottom-up processing. Lastly, the word encoding mechanism of "*quan*(劝)X" is analyzed and compound words "*quan*(劝)X" have two main encoding modes: "*quan*(劝)V" type and "quan(劝)N" type.

Key words: Morphology-syntax interface; Compound word; Encoding; Decoding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